



- 《人民的名义》
- 作者:周梅森
- 出版社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重磅推出

人民名义下的 殊死博弈

周梅森的长篇新作《人民的名义》，并不纠结于腐败事件本身，也不只写“打虎”的英雄人物，而是以官员涉贪为线索、公权私用为开头，揭示权力运作中的某些畸形政治生态、官场文化的某些霉变，进而观察“人民”名义的虚与实，拷问人性深处的恶与善。这样的作品直面政坛现实，主写政界事务，直击官场生态，塑造官员形象，是名副其实的政坛小说。

在这部作品里，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在调查一桩特大贪腐案件时遭遇车祸，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引子，它相继引来的，是踌躇满志的新任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的临危受命，是居心叵测的公安厅厅长祁同伟的如坐针毡，是心怀鬼胎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的暗流涌动。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、虎口拔牙的战斗，由此拉开了帷幕。

饶有意味的是，在侯亮平要处理高育良的前任秘书陈清泉前去向其

汇报时，高育良言之凿凿地说道：“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，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，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，所以，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，永远，永远。”而当高育良在不法行为败露之后，面对最后来看他的侯亮平，还放言高论：“为官者就得心正，心正则心安，心安则平安。”“公生明，明生廉。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，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。”“人民”二字他挂在嘴边，脱口而出，但并未真正走心、入心，只是弄权上位的广告词和争权夺利的遮羞布。这也说明，为官者尤其是高育良这样的高官、祁同伟这样的官员既不幼稚，也不糊涂，他们是明明白白地糊弄人民，清清楚楚地谋取私利。而因为他们的脸上戴了光鲜的面具，嘴上讲着正确的大话，人们既难以看得清楚，也难以很快识破。这种既有官位保驾，又有大话包装的贪官，是最为有害的，也是最为可怕的。

《人民的名义》所揭示的由各种

关系所维系，由各种力量所推导的官场生活，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。就汉东省与京州市而言，这里既有政法体系，又有秘书系，还有赵家帮、奸商帮……这些派系与帮派的存在，既使官场政治生活更显波谲云诡，又使反贪斗争加倍复杂。而长期浸淫于官场，又会有种种诱惑引诱。正如高育良自己说的那样：“中国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，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。其中，有人因为自身的努力幸运地站在潮头之上，潮头之上风光无限，诱惑无限，但也风险无限，就看你如何把握。”有的人站住了，有的人倒下了；有的人前行了，有的人后退了。差异与分别，正在于人性的放纵与持守、信仰的放弃与坚守。对祁同伟、高育良而言，官场就是魅惑人的名利场，在这里可以结党营私，自谋私利；而对陈岩石、侯亮平来说，官场就是一个冶炼人的大熔炉，在这里可以百炼成钢，更为

坚强。两类人物，两种选择，两种结局，真正的试金石与分水岭，仍然是“人民”。那就是，把“人民”作为名义挂在嘴上，还是把“人民”作为依托放在心上。侯亮平与祁同伟、高育良等人的不同命运结局也告诉人们，真心实意为人民的，人民始终是其坚强的后盾；而虚与委蛇人民的，终究会遭人民唾弃。

以贪腐事件和“带病”官员为标本，来深入探悉政治生态现状，发掘其中的痼疾所在，并对不同政治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进行辨析，让人们在认识现实政治的同时，反观人生，反思人性，反求诸己，这应该是《人民的名义》的真正价值所在。正是在写出当下官场领域的政治生态，以及官场人物各自心态的意义上，这部作品不仅有力地超越了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，也把当下政治小说的写作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书人书事

文学应为社会带来巨大思考量 ——访作家周梅森

3月28日，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在湖南卫视开播。原著作者也是该剧艺术总监、编剧周梅森长舒一口气：“接力棒终于交到观众手中。”

“潜心八年，六易其稿”“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”——这些印在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腰封上的推荐语，让人难以忽略它的分量。

生活远远走在创作前面

某部委项目处的处长，在机关房改房的家中被反贪总局问讯。他吃着炸酱面，口中不离“人民”“党和政府”。他每个月只给乡下老母亲汇300元的生活费，家中装修土得掉渣。而最终，在他的另一处隐蔽豪宅里，办案人员找到了现金239554600元！

《人民的名义》开篇的第一个案子，我们大都不陌生。

“这个原型就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。小官巨腐，能贪这么多，你能想象到吗？”周梅森一边说一边比划，有些激动。

“我写过不少反腐题材的小说，跟这些比都是小儿科了。腐败分子比我有‘想象力’‘创造力’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腐败事件，远远超出一个作家的想象。”

周梅森以《人间正道》《绝对权力》《国家公诉》等政治小说为人熟知。他有过挂职一年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，“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形式”。《人民的名义》里很多情节不仅来自真实的社会新闻，也源自他的生活。过去几年，身为作家的敏感性让他嗅到了波涛汹涌下隐隐生长的气息。他按捺不住，写写停停，写好了就收到抽屉里，也做好了许久不被读者看到的心理准备。

直到2014年11月30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去南京找到周梅森。用这位老搭档、老朋友的话说，是“三顾茅庐”才有了这部小说。

为了搜集素材，周梅森曾在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。有两件事让他至今难忘：一是那些从高处跌落的职务犯

罪分子的痛悔，“他们不是魔鬼，也有血有肉，却因为一个贪字，最后落得家破人亡”。另一个就是检察院先进的追踪技术和办案手段，“让任何罪行都无所遁形，这是我之前不了解的”。

这些年，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反腐深度报道。前不久，中纪委出品的纪录片《永远在路上》《打铁还需自身硬》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。这让周梅森感到了文艺创作的窘迫。

“生活已经远远走在了创作的前面。作家、艺术家的作品达到《永远在路上》的反映深度了吗？我们现在的文艺要紧跟追赶，才可能追上火热的时代。”

“我不认为《人民的名义》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品。为啥人们关注？这是一种社会期待，人民对文艺的期待。因为我们离人民太远了！”

警惕时代的利己主义者

《人民的名义》虚构了某省一场上上下下的反腐斗争，处处折射出现实的身影。

这影子，不仅是对真实案例的取材和文学化，更深层的，是对人性、对道人心的透视。小说里光有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40多个，官场是他们人生的舞台，是社会的放大镜，极致地袒露了人性的种种。

这里的人生，现实，真实，却也极其残酷。这里不仅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，还有许多的扑朔迷离：难以分辨的灰色地带。

“作家要有面对生活、面对严酷现实的勇气。”周梅森一次次地强调。

“有一种风气特别可怕，就是躲避文学的思想性，不再谈论文学为社会带来的巨大思考量，只关心如何把文章往精巧、玲珑、细腻里写，认为这是艺术，我不能认同。张爱玲、周作人都是有才情的作家，但称不上伟大的作家。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肩负起时代的责任，支撑起一个大的文化、一个巨变的时代的文学责任。像鲁迅，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伟大的作家。”

“最可怕的是，作家自己把心封闭

起来了。”周梅森亢奋的声线滑了下来，一字一顿。

“我们的时代有太多的利己主义者，或精致或粗糙。”

所以，在《人民的名义》里，周梅森设置了正面人物检察官侯亮平。

“侯亮平就像一把安全锁。我没有给他太多政治资源、家庭背景的交代，赋予他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。我们太需要英雄了，呼唤像侯亮平一样的秉公执法、执法如山的英雄。”

讲述“大中国的故事”

周梅森是从煤矿工人成长为作家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大时代变迁的轨迹与我的大人生相契合，始终是一位在场的作家。”

他不满足于写反腐小说，他希望文学全面介入社会生活，认为文学应该讲述“大中国的故事”。

他最想讨论的是土壤问题。

“《人民的名义》里的贪官各式各样：有的是知识分子，嘴上讲人民讲得最多，什么都懂，会人格美容，贪念也最大；有的是政治暴发户，从饥饿的年代走进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，他清楚地看到了时代的机会，把贪腐视为改换门庭的方式；有经济暴发户，革命家庭出身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倒背如流。还有一种，二三十年就在处级岗位上打转，反正也升不上去了，就把手中的权力拿来变现。”

“腐败最严重的不是贪了多少钱，而是人的堕落，是世道人心的失落。关键要改善土壤，改变政治生态，理顺关系，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，让正气得以张扬。”

但反对腐败和展示腐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，如何把握这个尺度？

“一是作品是否真实反映了时代，二是作品是否包含健康向上的力量。就像眼前的这半瓶矿泉水，有信心的人会说还有半瓶水，没有信心的人会说只剩下半瓶水了。”

“我只是作家，并不能给出药方。”周梅森话锋一转，坦率地说，“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。” 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

作家简介

周梅森，男，1956年生，江苏徐州人，当过矿工，文学编辑，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，下海经商，从事过房地产开发、实业经营、证券投资，现为国家一级作家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。他出版有《周梅森文集》(十二卷)、《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》(三卷)、《周梅森反腐经典小说》(五卷)、《周梅森读本》(七卷)，以及《黑坟》《原罪》《沉沦的土地》等中长篇小说73部。他编剧并参与制作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连续剧《人间正道》《中国制造》《绝对权力》《至高利益》《国家公诉》《我主沉浮》《我本英雄》《人民的名义》等10余部，多次获国家图书奖、全国五个一工程奖、全国优秀畅销书奖、中国电视飞天奖、中国电视金鹰奖等，被誉为“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”。

日报云阅读



短网址: <http://shouji.lyd.com.cn/n/791639>



隋炀帝建洛阳西苑植牡丹(1)

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植牡丹，开启了我国规模性观赏牡丹栽培的历史。隋炀帝虽然是为了自己的享乐，但对牡丹的发展做了一件好事。

北宋刘斧的《青琐高议后集·五·隋炀帝海山记》载：“帝自素(杨素)死，益无惮。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，役民力常百万。内为十六院，聚土石为山，凿为五湖四海，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，驿至京师。”该文接下来记述道：“陈留进十色桃”“青州进十色枣”“南留进五色樱桃”“广南进八般木”……“易州进二十箱牡丹：赭红、赭木、靛红、坯红、浅红、飞来红、袁家红、越州红、醉妃红、起台红、云红、天外黄、一拂黄、软条黄、冠子黄、延安黄、先春红、颀风娇”“天下共进花卉、草木、鸟兽、鱼虫莫如其数，此不具载。”

公元605年，杨广篡夺皇位自立为皇帝。即位之初，他就决定在洛阳伊洛河间建东京。大业元年(公元605年)三月，诏令宰相杨素为营造东京总监，宇文恺为副总监，于洛阳城西八里处建周长达三十七里的新城。为此，每月征发丁夫二百万人，星夜修建，十个月建成。新建的东京城，城内各宫都建有内苑园林和禁苑。官城的西北部建有九洲池，是宫内的游赏区。在广阔水面上建了数座小岛，岛上有亭榭楼阁，再现了东海仙山楼阁的美景。大业二年(公元606年)四月，隋炀帝仪仗进入东京洛阳，后改为东都。就在营建东都洛阳城的同时，隋炀帝在城西开始营建皇家禁苑——西苑。隋炀帝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，很短的时间西苑就建成了。

西苑是什么样子？《海山记》载，西苑周回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，在今天的洛阳西工以西至新安县城内，北至邙山，南至洛河，比东都城还要大。在这样广阔的空间，隋炀帝把河水从西引入再东注于洛水。

隋炀帝开西苑，史籍有载。《隋书·炀帝纪上》载：“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，以实园苑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〇也载：“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异兽，以实园苑。”而且直至今日，洛阳还有不少西苑的遗址遗迹。然而，当代学者对“易州进二十箱牡丹”之说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是一种误传。有学者指出，刘斧的《海山记》是一部以隋炀帝营建西苑、巡游江都为题材的传奇小说，不足为信；小说作者不是唐时人而是北宋时人，小说也著于北宋；唐时牡丹始盛，尚无品种名称，直到北宋才育出“姚黄”“魏紫”等名品，所以，隋时易州进二十箱牡丹，且有十八个品种之多，可能是作者以宋代牡丹品种为据所作的虚构描写。隋炀帝开西苑植牡丹之说，在中国园艺史上影响深远，而当代学者的质疑亦言之有据，究竟如何判断呢？著名牡丹专家李嘉珏教授认为，易州(今河北易县)从来没有关于牡丹的记载，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哪来牡丹可引？隋代有易州牡丹引来洛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洛阳周围很多地方都产牡丹，而隋炀帝划定的西苑面积很大，其中一些地方就有牡丹！因此，有学者指出牡丹从隋代进入皇家园林，没有错，但并非来自易州，而是洛阳本地原产。

书界动态

我市作者新书《仿古城墙》日前出版

我市作者张建伟新书《仿古城墙》日前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北江省汉威市。风狂雨骤，内涝严重，晨光区棚户区受灾严重。经多方调研、上下博弈，终定改建大计。村民安置房与仿古城墙建设启幕，宏图徐徐展开，相关决策者却遭受非难，他仍负重前行，试图突出重围……

人性、政治、历史立体掘进，亲情、爱情、民情交叉演绎，凸现作者深刻的人文关怀、敏锐的时代感知。大痛苦、大悲悯、大担当的叙事情景，使作品充满现实的张力，共振着时代的脉搏，激荡着温暖的正能量。

张建伟，洛阳市人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风声雨声》《风声雨声2》和散文集《心祭》等。

(文轩)

5部作品荣获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”

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(2016)”颁奖典礼近日在京召开，冰岛作家埃纳尔·费尔·古德蒙德的《酷暑天》、俄罗斯作家古泽尔·雅辛娜的《祖母依哈睁开眼》、德国作家海因茨·海勒的《本来我们应该跳舞》、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·马里亚斯的《父亲岛》、尼日利亚作家A.伊各尼·巴雷特的《黑庭》，获得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”。其中，冰岛作家埃纳尔·费尔·古德蒙德的《酷暑天》荣获第三届“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”。

颁奖典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韬奋基金会联合主办。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”各位评委、相关国家使馆人员、翻译界、出版界、外国文学研究者及外国文学爱好者等近百人参加了颁奖典礼。

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2001年共同设立，并于2002年首次出版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”丛书。至2016年止，该奖项已成功举办了15届，共有24个国家92位作家的作品获奖。(据《中华读书报》)